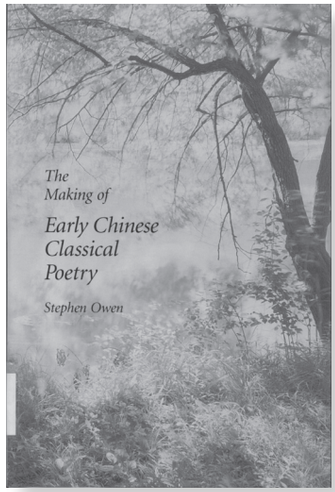
BIBLID 0253-2875(2007)26：3 pp.54-57

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By Stephen Owe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60pp. ISBN 978-0-674-02136-5

在美國漢學界的唐詩研究中，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中國文學及比較文學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一直享有盛名，宇文教授和許多美國漢學家一樣，有直接閱讀中文文本的能力，他對唐詩研究有極大的興趣，他認為要理清唐詩發展的脈絡，就必須向前回溯，因此在 1970、1980 年代有了《初唐詩》（*The Poetry of Early Tang*）、《盛唐詩》（*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二本書的出版；而在他的新作 *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中國早期詩歌之形成》）更將研究範圍拉至漢魏時期。

宇文教授的研究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具有懷疑性的考察、有力量的推理、豐富的想像力、能推翻一些積非成是的正統觀念，成立新的論說，甚至於能震動讀者。我們一向都認為漢魏詩歌是由樂府變而為古詩十九首，然後演變成建安之文人詩這樣的一個過程，但根據宇文教授的考察，很多「漢魏」詩歌經過齊梁學者的刪改、編寫、整理，才成現在的模樣。所以應該是某一些三曹的作品先成形，然後可能在魏晉時候成了古詩十九首，而一直到六朝後期才有我們今天所閱讀的「漢樂府」。我們一般都覺得「作者」、「詩篇」、「文體」與「由樸素至精致的文學演進」這些觀念是理所當然的，作者卻證明這些習慣觀念對於了解古代詩歌非常有問題，會遮蔽漢魏詩之真相，他的新看法為：1. 很多早期詩根本沒有作者可以確定，不如說是述而不作、拼湊而成的；2. 最早有篇無詩，有詩料的來源而無詩；3. 像詩樂府這些文體之區別是後來加的，只能表示資料來自某一種文獻，對原來的資料沒有用處；4. 早期詩沒有很明顯「由簡至精」的敍述性質，僅能看作一種「不規則的 恍惚混成之物」罷了。

宇文教授這些突破性的看法，使他能解釋很多目前未能說明的問題，以下就略舉幾個例子說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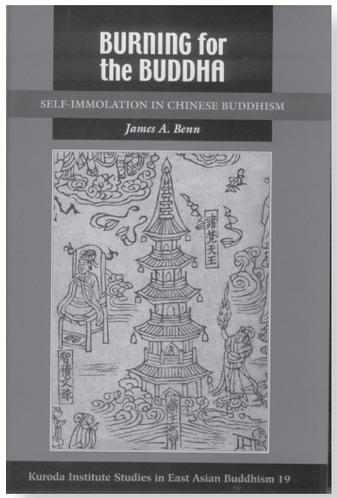
1. 一般認為由李延年寫的〈李夫人歌〉結尾有九個不同版本之異文，但作者認為沒有一個算得上是「最正確的」；
2. 像班婕妤 之〈怨歌行〉或者李延年之〈李夫人歌〉，從前都認為有詩樂府之分的不同文體並無此理；「樂府」只不過是反映一種偶然的書籍解題上的來歷而已；
3. 一般認為有陸機《擬古詩》19 首後才有稱為「詩母」的古詩 19 首。但其認為陸機寫的時候現在的「古詩 19 首」尚未成體；
4. 現在我們都以為曹植〈野田黃雀行〉是他很重要、很典型的作品，宇文教授證明南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之前沒有任何資料說明〈野田黃雀行〉與曹植有關，一直到清朝這首詩才跟曹植一些流行的傳說開始扯上關係，成為我們今天的看法。作者屢次使我們注意到，曹植的名字似乎變成吸引許多雜詩的一塊「磁石」了。

按照傳統詩歌演進，有權威的說法、有固定的作者、固定的詩篇、固定的文體與固定的演進故事，現在都被宇文教授徹底反駁了。那麼剩下的資料如何看呢？大概是一些很雜的手稿的片斷，具有表現共同的演唱曲目與編寫習俗，在古代的興亡過程之下古詩之命運往往是存一漏百。現在能看到的殊非 「作者原來之意」而是在不同手稿裏偶而倖存的「演出」或者實現，而且傳述非

以「整篇詩」為單位，往往是斷章取義，詩之章句可長可短、參差不齊，是由不同習慣套用的公式語言與一些習慣上湊在一起的主題拉雜湊而成章的。

宇文教授這些新看法具有革命性，此後我們對漢魏詩要改觀，要「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了。這包含不少複雜的問題，其中很嚴重的就是價值問題，撇開作者詩篇文體與傳統詩歌演進的說法，到底哪些古詩的「材料」最重要、最有價值呢？這本《中國早期詩歌之形成》並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由此觀之此書的書名不如說是「中國早期詩歌之破壞」了！這給後來研究中國古代詩歌的學者很大的啓發、很大的挑戰。個人認為 20 幾年以來自從宇文教授寫了傳統詩歌與詩學之後（1985），《中國早期詩歌之形成》是我看到的最重要的一本書，對任何喜歡古詩的讀者來說是必讀之書。（麥大偉（David McCraw），美國籍，美國夏威夷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University of Hawaii, USA）教授）

Burning for the Buddha: Self-immolation in Chinese Buddhism



By James A. Ben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376pp. ISBN 978-0-824-82992-6

本書的作者 James A. Benn 為加拿大 McMaster University 宗教系副教授，他在新出版的 *Burning for the Buddha: Self-immolation in Chinese Buddhism* 一書中，探討中國佛教的捨身／燒身，這也是第一本以一本書的篇幅，以理論為基礎並從歷史的角度出發討論此課題。他在這本書除了探討有關中國佛教捨身的課論，更涉及歷代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情況，和與中國本土文化（包括道教與民間宗教）之間的關係，尤其是著重於中國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與身體修行（Body Cultivation）這兩方面。

作者先界定 Self-immolation 與 Auto-cremation 兩個詞彙的意義，他將 Self-immolation 翻成「亡／忘身」、「遺身」與「捨身」，而 Auto-cremation則譯成「燒身」與「自焚」，清楚釐清兩者的差別。根據作者的觀察，捨身並不侷限於某一個時代，而是從佛教傳入中國以來，一直到近代社會，都一直不斷有這樣的事例發生。因此，本書從歷史的觀點加以考察，說明每一時代所具有的特色與現象。此外，亦從性別學的角度，考察捨身與燒身的身分，除了比丘之外，許多比丘尼也有這種宗教經驗。

除了前言和結論提出作者的研究方向與目標之外，全書主要採用荷蘭的中國佛教史大家許理和（Erik Zürcher）提出中國佛教歷史學的新理論， 作為立論的基礎。許理和提出的中國佛教歷史學具有三大指導方針：第一，不可忽視豐富多元的資料；第二，為了更瞭解中國佛教發展的「正常」（Normal）面，也應該多方考慮部分宗教「反常」（Abnormal）的因素；第三，中

國佛教學是一個跨領域學門，同時包括了宗教學與歷史學兩個學門。

作者所運用的研究材料，多以佛教典籍、佛教史料、中國歷史文獻、各廟宇寺志（史略）以及諸多比丘和比丘尼傳記（包括《名僧傳》、《高僧傳》、《比丘尼傳》、《續高僧傳》、《宋高僧傳》、《補續高僧傳》和《新續高僧傳四集》）等為主，還有包括中國、日本與西方等相關參考文獻。尤其特別列舉以《妙法蓮花經》〈藥王菩薩本事品〉、《大智度論》等中國佛教傳統的經典為基礎，作為觸發捨身修道行為的依據。

經由詳細論證之後，作者提出四點宗旨：第一，確定捨身並不是一種稀罕行為，而是各時代皆經常發生的事件；第二，確定捨身的修道經驗，是基於各元現象、多樣變化與多種解釋的成因；第三，確定捨身修者的行為，與中國佛教內、外世界的關係密切，彼此互為影響；第四，研究捨身的主題，能夠分析與瞭解宗教信仰與身體修道的關係，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及受到多方學界的關注。

另外，作者也從佛教發展、佛法教理、政教關係、宗教崇拜等不同角度，探討捨身在中國流傳的種種現象：從佛教發展的角度來說，作者強調中國佛教所修的捨身，在印度根本佛教時並未受到特別重視，可見捨身是在中國被提倡而發展出來的一種修行方式。尤其舉證中國佛教修行捨身與燒身的過程，與道教修神仙之道的絕糧粒、絕五穀等絕食經驗有相類似的情形，而且修行捨身與燒身所採用的佛教經典，有些解釋明顯受到道教的影響。因此，這種修行方式可以算是佛教的「中國化」（Sinicisation）的條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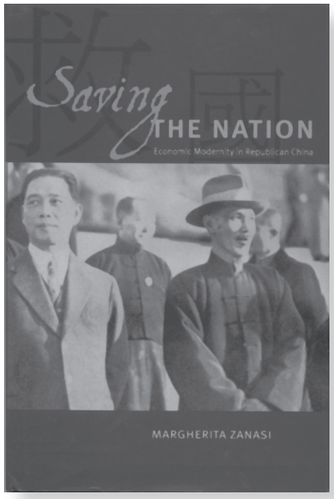
從佛法教理的角度來說，本書作者主要參考《法苑珠林》與永明延壽禪師所寫的《萬善同歸集》等資料，藉由提出的捨身與燒身是否為一種「好的修道」？「正統佛法」是否接受與肯定捨身與燒身？ 捨身與燒身究竟屬於布施波羅密的表現？亦或算為自殺的行為？「正統的理論」（Orthodoxy）與「正統的修道」（Orthopraxy）之間如何相互配合等問題，試圖探討捨身與燒身的合法性。

從政教關係的角度來說，捨身還表現在政治的思想與行為上，進而提出政治上的暗示。作者特別注意到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方，統治者對於捨身所提出的概念，以及所受到的影響。由此可見，捨身能夠在中國佛教長期發展，與修行者、統治者和信眾之間的互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從宗教崇拜的角度來說，捨身與燒身後有可能會產生舍利。作者認為信徒對舍利的崇拜，最早起源於佛陀時代的對佛陀的永恆懷念，而在中國所產生的舍利，則是藉由權力與效力的提供來傳承佛教。此外，在中國佛教近代史上，也由於舍利崇拜的緣故，而形成不少著名且神聖的「塔院」與「名山」的事實。此種舍利崇拜的觀念，到近代中國則轉變成崇拜「死後不壞之身」的新方式，即僧者常會預知自己圓寂的時間，信徒便將僧者的身體轉變成「不壞的肉身」，再進入寺廟接受信徒的供奉與敬仰。

綜而言之，這本書不論從宗教學、佛教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中國文化學等學門，皆有很大的貢獻。未來，為了能延續或補充這項研究成果，建議學者們能更深入瞭解現代佛教的情形，以及捨身與燒身在日本、韓國等地的發展狀況，藉以明瞭中國佛教捨身的現象，在東亞佛教發展過程所具有的地位與特色。（史芬妮（Stefania Travagnin），義大利籍，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宗教研究所（Department of the Study of Religion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博士候選人）

Saving the Nation: Economic Modernity in Republican China



By Margherita Zanas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all 2006.

336 pp. ISBN: 978-0-226-97873-4

經濟現代化與現代國家的建立息息相關，但長久以來，大部分的人很難對二者做界定，《救國》一書的作者曾瑪利（Margherita Zanasi）為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歷史系副教授，在她的新作 *Saving the Nation: Economic Modernity in Republican China*（《救國——中華民國的經濟現代化）對於中華民國 1911 年建國以來，自傳統帝國轉變為現代化國家的歷程有著詳實的描述，並以中國為例，進一步挑戰馬克斯主義者及結構主義者，認為國家的誕生，並非科技與社會經濟下的產物，而是現代化的國家塑造了國家經濟。作者以中華民國的經濟現代化為中心，討論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特徵、經濟現代化在國家建造中所扮演的角色、國民政府如何能在內部歧見下推動經濟現代化等問題。

本書始自 1927 年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與汪精衛的武漢政府宣告合併，一直到 1937 年國民政府對日宣戰止，即以國民政府在南京的十年間（the Nanjing Decade）研究範圍，探討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於建設中華民國成為一現代化國家的努力，以及兩個觀點截然不同的政治團體（蔣介石、宋子文與汪精衛、陳公博）如何在內部衝突中、在對日關係的歧見中，決定中國的未來。

本書的第一部分，著眼於中國知識份子想像中的中國，第一章探討自孫中山去世，汪精衛與陳公博身處中國的危機中，提出所謂「民族經濟」的概念，發展民族工業以對抗外在帝國主義勢力，促進中國的經濟現代化。第二章則敘述國民黨以勞動生產為中心的農村政策，以及在推動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進行農村改革所面臨到黨內（蔣介石及汪精衛）及黨外（國民黨及共產黨）的歧見。第二部分著重在南京的國民政府如何推動經濟建設及國家現代化的改革。第三章及第四章關注於宋子文與其所創設的全國經濟委員會以及棉業統制委員會等合作組織，這些組織如何扮演蔣介石及汪精衛二分裂的政府在經濟改革上的合作角色。第三部分則是描述「民族經濟」的概念如何落實為實際的改革，尤其是棉業統制委員會分別在農村及城市的改革以及其所面臨的問題。最後，則從汪精衛下野到蔣介石另成立資源委員會，為日後戰爭資源做控制，說明蔣介石的經濟觀。最後一部分作者分析汪精衛及蔣介石對日本戰略上、對共產黨態度上的差異，申論汪精衛等知識份子經濟理論的失敗，並對蔣介石建立的軍事化國家的批判。

過去現代史研究，學者對於國民政府在南京的十年稱之為「黃金十年」，認為對日抗戰的基礎奠定於此，但也有部分學者批評在這十年間蔣介石實施「以黨治國」的施政方針，阻礙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救國》一書的作者曾瑪利為讀者提供了新的面向，她分析蔣介石與他的幕僚在這十年間，一直推動著國家經濟現代化，至 1936 年，對日抗戰的前夕，中國的經濟已到達了頂峰。另外，作者以極大的篇幅描述汪精衛及陳公博對於經濟現代化的想法，以及汪蔣間的衝突與合作，但作者相信，兩者皆企圖以其認為正確的方式「救國」。

（廖箴，《漢學研究通訊》主編）